

# 聊城大运河遗存保护之忧

徐家鹏

2006年6月,京杭大运河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的3年中,运河沿线各城市一直致力于保护、发掘、提升运河文化价值,以实现将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目标。然而,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的保护工作仍存在着诸多缺失,沿线文化遗存不能被有效保护和利用就是其中之一。细观山东聊城,可窥知运河沿线城市的保护之忧。

## 不少水利设施已丧失原有作用

京杭大运河聊城段是古代会通河的一部分,位于聊城市下辖的阳谷县、东昌府区、临清市境内,全长97.5公里。元、明、清时期,会通河一直是南粮北运以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聊城也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兴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达400年之久,至今聊城运河沿岸还保留着大量水利工程设施及其他重要

文化遗存。“崇武驿”是京杭大运河聊城段上一处保护较好的文化遗存。”据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清义介绍,明清时期“崇武驿”多为官府所用,俗称“大码头”;与其同在的还有闸口南邻的一处供富商使用的“小码头”。“这两处码头仅仅是运河聊城城区段上众多文化遗存的一部分,与乡镇段上的运河文化遗存比较而言,其受保护程度要好得多。”

在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二楼聊城厅入口处,摆放着一尊由梁闸“迁人”的“镇水兽”。陈清义介绍说,这似狮又似虎的“镇水兽”是龙的一种,原在聊城境内梁闸的雁翅上,运河拓宽时,被移到运河博物馆中。“这种镇水兽嘴和肚子都很大,在我国古代桥梁和闸坝建筑中,多用在栏板柱头或雁翅上,作用是镇伏桥下‘水怪’,防止水患、避免水害。”

## “天涯海角”发现古城墙遗迹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三亚市相关部门获悉,经过考古专家一个多月的挖掘,崖州古城考古已发现50米长的宋代遗存的城墙遗迹。经专家判断,已基本确定崖州古城的城墙走向和城墙北部边界。今后崖州古城墙重建,将与此次发现的古城墙遗址走向保持一致。

崖州古城位于三亚市崖城镇,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地理位置上最南端的一座古城,有着两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据介绍,为进一步弄清古城墙走向、结构、保存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为古城的修复与保护提供科学的考古学依据,恢复崖州古城原貌,在三亚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于近日再次对崖州古城南部城墙进行发掘,并确定了崖州古城的城墙走向和城墙北部边界。

本次发掘地点位于三亚市崖城镇崖城村,文明门东侧16米处,发掘总面积400平方米,是在今年5月至6月发掘的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挖掘。清理出东西向夯土城墙1条,城墙墙基包砖1列,灰坑3座;出土陶器、瓷器、石器、铁器百余件;遗存分属宋代、明清、近现代。宋代遗存的遗迹主要是分4次夯筑的夯土城墙,遗物为城墙上部散见的器物,有瓷器、铁器、钱币以及陶制建筑构件等。本次发掘出的城墙遗迹夯土长达

50米,分4次夯筑而成,整体结构和夯筑的方法一致,城墙北部边缘以及后期居民取砖所留下的坑道清晰可见。

“新发掘出的城砖墙体厚实宽大,与本地儒学堂窑址、窑塘窑址等地所出的城砖相似,这些砖未被后期取砖破坏,实属万幸,其年代还需进一步对比研究才能确定。”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刘长博士介绍说,本次发掘确定了崖州古城古城墙的基本走势和状况,其中最早的宋代夯土城墙夯土纯净,土质坚硬,夯层较为清晰。根据城墙上土质残留痕迹,推测夯筑方法应为平夯,再根据《崖州志》及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崖州古城城墙最初为土城,并经过多次加宽和修补,本次发掘亦发现城墙墙基所用夯土的土质土色有所区别,说明城墙内外均进行过多次的加宽和修缮,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据悉,崖州古城文明门遗址考古发掘田野工作还在继续,不久将转入室内整理阶段。室内整理阶段将对夯土城墙进行解剖和对发掘出土的材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对城墙结构和年代进一步分析,对瓷器的包含物、产地、釉质等进行检测,以尽可能多地复原城墙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和数据也将为今后修复崖州古城提供科学依据。(郑玮卿)

与梁闸一样,在运河七级古闸遗址的桥头上,至今还存有石雕“镇水兽”。

七级古闸横跨运河两岸,元代所开的会通河穿镇而过,渡口码头处建有七级台阶,故名“七级”。明清时期,七级镇凭借运河漕运繁盛之利,为阳谷以东重要的水运码头和货物集散地。镇内曾设六门四关,纵横长街势如棋盘,现今残存的古街巷、码头遗址位于镇西古运河东岸,街市商铺相连,依稀可辨。

聊城市文物局副局长吴明新介绍说:“七级古闸为当年运河上重要的水利设施,其设计合理,施工精细,是研究运河漕运历史及运河古镇形成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其实,梁闸“镇水兽”迁入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说明了一个现实问题——部分运河段的文化遗存没能得到有效保护,其水利设施也几乎丧失了应有的作用。对此,聊城市有关部门并不否认。不过,近几年,该市相关部门对聊城城区段和临清城区段的运河适时进行了疏浚和整治,对运河沿线文化遗存的保护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 统一保护存在体制制约

历史上,聊城的兴衰是与大

运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如何认识、保护、开发、利用这一宝贵遗产是一个需要好好研究的重大课题。”聊城市文物局副局长王庆友在介绍运河聊城段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时说,“聊城运河文物损毁严重,保护状况不容乐观。”

此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保护规划编制组对聊城运河临清段、东昌府区段、阳谷段进行了详细调查、测绘,并搜集提供了编制规划所需的规划、水利方面的大量资料,其间也发现了诸多问题。

由于漕运功能的丧失,很多运河段已成为灌溉和排水河道,河道淤塞严重,部分河道被民居占压几近消失,部分船闸、桥梁等水利设施损坏较为严重,亟须修缮和保护。聊城市文物局对当前运河聊城段保护和利用情况给出的回答是:运河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空间跨度大,其中聊城段的保护涉及3个县(市、区)10余个乡镇,现存情况差别很大,统一、综合保护存在着体制上的制约。

## 未来:防止文物遭到破坏

据吴明新介绍,近几年,聊城市对运河聊城城区段部分河道上的大码头、小码头等水利工

程设施进行了保护、修缮,同时对临清二闸实施了同样的保护。“实施保护的运河沿线重要文物建筑还有聊城山陕会馆及临清运河钞关、鳌头矶、清真寺、舍利塔等。”周家店船闸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十一五”文物保护单位项目库《大运河文物保护工程》的重点抢救性保护工程。

“目前,聊城正在筹备对阿城盐运司、冀家大院、汪家大院等运河民居的修缮。”吴明新说,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规划编制的《大运河遗产山东聊城段保护规划(2010—2030)》目前已批准实施。这部规划提出了3个目标,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并延续大运河聊城段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全面地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空间跨度大,其中聊城段的保护涉及3个县(市、区)10余个乡镇,现存情况差别很大,统一、综合保护存在着体制上的制约。

另据聊城市文广新局方面介绍,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对运河的保护和利用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大规模的调水和治污不仅为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修复带来机会,而且也使大运河的整体性保护成为可能。不过,这也可能给运河上的一些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如古闸、古桥、古街区等造成一定的影响。



日前,纪念紫禁城建成590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85周年“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在北京展出。此次展出的永宣文物精品共有163件套,分为书画、金器、漆雕等8个部分,其中有12件来自西藏、青海和湖北博物馆。图为游客在观看“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展品“掐丝珐琅龙凤纹炉”。

新华社记者 汪永基 摄

# 博罗尼亚：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

谢方

博罗尼亚位于意大利北部,是个富裕的历史文化名城,市中心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建筑群体——建于1088年的欧洲最古老大学博罗尼亚大学。博罗尼亚城市规模不大,人口不到50万,老城居住人口不足10万。老城因为拥有两座建于中世纪的姐妹塔楼(一高一矮)而闻名遐迩。另外,博罗尼亚城市里的人行道均以走廊形式修建,故被建筑师称为“柱廊之城”。

意大利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起步早,数量多、质量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在那里已经上升为一种全民意识。博罗尼亚则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整体性保护)的城市。所谓“整体性保护”,就是既要保护有价值的古建筑,还要保护生活在那里的居民的原生态,留住原来的居住者——一般指社区里原有的低收入家庭。

在博罗尼亚旧城改造过程中,同样也面临开发后的住宅走向“绅士化”的倾向。“绅士化”这个词是从法语词根演变而来的,在城市社会学中特指“中上阶层涌入传统蓝领阶层居住区”,这个潮流往往伴随旧城改造而来。旧城改造,这条看似光明的前途却有着难以想象的阻力——因为居住在原社区里的低收入家庭没有能力承租经过改建后的房屋。

1970年,当时的博罗尼亚市政府由意大利共产党执政,市政府聘请罗马著名的建筑规划师菲拉托拉担任总规划师,提出整体保护规划,其要点是利用公众住房基金改善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保护古建筑;并用法律形式规定居住其中的90%以上的旧住户必须留下来,居住在社区里的低收入家庭的租金不能超过其家庭收入的12%至18%,从而实现历史街区里“原来谁住的房,改造后还由谁住”的旧城改造目

标。举例来说,在某个街角,开发前是面包房、咖啡馆或花店,改造后仍归原主人管理。这项改造规划因为照顾了社区中、低收入家庭和小店主的利益,因此深得居民欢迎,群众参与热情非常高。

博罗尼亚旧城改造取得了成功,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完整保护了古城的风貌。古城风貌不仅包括那些有形的文化遗址,如宫殿、教堂、街巷、旧房,还包括一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无形的文化内涵——如民俗、民情、生活方式与社会风尚。古建筑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表现了城市文化中最直观和最表层的一面,而每座城市独有的景观才是城市的灵魂。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在于居民的文化生活,它的实质不是僵死的古董和遗址能够涵盖的,而只能在居民的生活方式中去找。

博罗尼亚另一个保护古城的举措是用经济杠杆协调城市生活。几年前,笔者在博罗尼亚老城闲逛,见一隔离墩立在马路中间,一位老先生开着吉普车在隔离墩前戛然而停。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朝隔离墩旁边的机器插进去,不到半分钟,隔离墩就自动下沉到地面了,等老先生车子开过,隔离墩又慢慢升起……博罗尼亚人用自动隔离墩限制车辆进入中世纪街区,这样做并没阻碍现代交通工具进入古城,但能用经济杠杆限制汽车流量。有车族自然会考虑进出自家门都要付过路费是否值得;经济状况差的邻居也不会嫉妒有车族——人家是付了费的。过路费成了市里的税收,用在城市道路建设维护与公共交通的改善上。

城市管理者用公共政策协调城市生活,让“绅士”和“平民”都能心平气和,才真正体现出城市保护的人文价值,实现了经济、人文、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目标。

## 老街故事

“书院门”位于陕西西安市南门外东侧。它既是一座恢弘大气的牌楼,同时也是一条街的名字。这条街的得名,缘于街上的关中文学院。今天,西安人通常所说的书院门,更多指的是从碑林到关中文学院门口的这一条步行街。整条街由青石板铺成,两旁是一些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这些建筑多被用来开设店铺,有卖笔墨纸砚的、有卖名人字画,每家店铺都被装修得古色古香,人们常常看见这里的店铺老板袖着手坐在里面,有的还捧着个紫砂壶,眯着眼睛,但从不吆喝。

## 由书院而雅集

关中文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



老街景象

# 书院门：那正在远去的背影

陈城文

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四大书院之一。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陕西著名学者、御史冯从吾因为忤怒神宗被罢官后回归故里,与友人萧薰之、周淑远等人在今天书院门以西的宝庆寺讲学。多年后,随着弟子越来越多,寺庙就愈发显得地方促狭。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10月,陕西省当时的最高行政长官——布政使汪可受连同其他几位同僚在宝庆寺的东面

小悉园一带为冯从吾创建关中文学院。书院中建讲堂六楹,匾题名“允执堂”。冯从吾《关中文学院记》云:“书院名关中,而匾其堂为允执,盖借关中‘中’字,阐允执厥中之义耳。”书院中有讲堂和师生宿舍,大门原本朝南向而开,后来改为向西向。3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亨又在书院中建造了一座“斯道中天阁”,专门用来祭祀孔子,至此,书院已初具规模。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重视教育,专项拨款给关中文学院1000两白银作为书院经费补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巡抚毕沅莅任之初,以为“移风易俗,教化为先”,于是重新修建关中文学院,并延请江宁进士戴祖启来陕主持关中文学院,还在全省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书院学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陕西巡抚升允改关中文学院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

从关中文学院建成开始,关中地区的历届科举考试都在这里进行,大量考生的出现,带动了书院周边业态的生成,旅馆还有一些书店和古玩字画店应运而生。应试者就在这条街上食宿,温习功课以及娱乐放松。因为多是读书人聚集的地方,相应衍生出的商

业活动也是极文雅的。距离关中文学院不远的地方是西安碑林,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的。之后历经几朝的征集,收藏不断扩大。书院门街区文化市场的形成,起初也是因为一些人为谋生计拿宣纸到碑林里面拓片了来卖。生意还很红火,于是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条街的商业氛围,有“雅集”之称。

## 古今之变

除了古玩字画,游览书院门,游客会发现这里的小玩意也多。在这些小玩意中,有一种叫做“埙”。埙是中国最原始的一种古乐器,葫芦状,身上有8个小孔。古埙从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先民遗址中出土后,一直默默无闻。相传贾平凹写《废都》时,邀三五好友月夜登城吹埙,浑厚、悠长、闷浊、神秘、暖昧的埙音让西安人都竖起了耳朵。一夜之间,书院门的所有摊点上摆满了陶埙,西安人把这个复活的古乐器,推荐给南来北往的游人,一晃这么些年过去了,埙似乎成了西安的一个标志性物品,埙音,也在各色人等的指间飘忽不定。走在书院

门,耳边常常会有卖埙的摊主吹奏的埙音。

此外,不能不提的还有玉。与别的地方不同,书院门兜售的玉器,多是来自西安的柞县蓝田。蓝田玉是中国的名玉之一,历朝各代对蓝田玉的开采从未间断,近水楼台,西安的书院门,自然少不了蓝田玉。

当然,书院门这地方最离不开的是“书”。这“书”涵盖书、画及相关的一切。古人遗迹有些遥远难觅,但近人的佳作作会在某个小店的角落里熠熠生辉。“长安画派”的风云人物石鲁,“文革”中穷困潦倒,一碗羊肉泡馍换了一幅画,老先生羊肉泡馍吃了不少,画也留下不少,这些墨宝,经过沾染油渍的厨师之手,说不定哪天就在书院门露面了。如今人们手中攥着的百元大钞,上面的头像出自西安画家刘文西之手,在书院门,刘文西的墨迹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画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书院门一带有许多赝品书画出售,低廉的价格满足了一些附庸风雅者的嗜好,这些交易的背后,是未名人的无奈和无助,如同书院门一个小店的对联:“红日当空,斯文待归。”



书院门牌楼

“文革”后期,书院门经过几百年的风霜雨雪,两旁的酒肆、茶房、店铺已荡然无存。整个街区都散发着年久失修的残破气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西安市经过规划设计,由碑林区政府实施,历经3次改造,恢复其为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仿古商业街。住

在街区周边的人们常说,过去那种浑厚的历史韵味已经消失大半,只有极专注地找寻时,才能从中察觉到,原来老街的骨子里还是透着古色古香,但仅存的气息也是为了更加清晰地提醒人们老街那正在远去的模糊背影。